



ILIAD  
**伊利亚特**

[古希腊]荷马著 陈中梅译注  
译林出版社

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图书馆



207193972

I545.22

G452



# 伊利亚特

[古希腊] 荷马 著 陈中梅 译注

## ILIAD

译林出版社



I545.22  
G452

719397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伊利亚特／(古希腊)荷马(Homer)著；陈中梅译注．-南京：  
译林出版社，2000.7(2004.1重印)

(世界英雄史诗译丛)

书名原文：ΙΛΙΑΔΟΣ

ISBN 7-80657-077-2

I. 伊... II. ①荷... ②陈... III. 英雄史诗-古希腊-古代  
IV. I545.2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0)第26049号

书 名 伊利亚特  
作 者 [古希腊]荷 马  
译 注 者 陈中梅  
责任编辑 施梓云  
原文出版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http://www.yilin.com>  
地 址 南京湖南路47号(邮编210009)  
集团地址 江苏出版集团(南京中央路165号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江苏新华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 张 25.5  
插 页 4  
版 次 2000年7月第1版 2004年1月第3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657-077-2/I·071  
定 价 (精装本)36.8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 世界英雄史诗译丛

### 出版说明

古代文化意义的史诗可以涉及多种主题,如神话、传说、宗教、历史、哲理、伦理乃至动物故事等等,但所有史诗中最令人神往的无疑是各民族歌颂他们光荣祖先的丰功伟绩的英雄史诗。

英雄史诗以诗行组合了历史和英雄。尽管史诗中的历史是传说时代的历史,涂染着浓厚的神话色彩,闪烁着对远古的回忆与联想,但它把那些要世代代牢记的教导传给人们;史诗中的英雄是民族的理想化的英雄,他们具备一般勇士的特征,又具有超人的能力,他们是一个民族在草创、开拓、发展进程中各种斗争的胜利者的总称。“九功之德皆可歌。”(《左传·文公七年》)歌颂这些英雄的赫赫威名,赞扬他们的“九功之德”,是民间歌手与文学作者的光荣责任。这些无名的与有名的伟大诗人传唱、记录、整理乃至再创他们民族的英雄史诗,以高昂的基调、庄严的文体、匀称的形式、动人的叙事展示着这个民族文化代码和精神气质的独特性,而这些史诗,在漫长岁月的冲刷中已沉积为民族意识和民族精神的重要基石。

今天,史诗中的英雄时代已经遥远,但英雄们那些寻求与开辟、夺取与保卫、艰难飘泊与返回家园的寓言仍然意味深长。世界文化的交流与融汇呼唤对民族文化和民族特色的再思考与再认识;人文与社会科学多种学科的学术研究需要深入开掘古老文化宝山中新的矿脉;中国的广大读者更希望在最接近原文的译本阅读中得到欣赏高贵的阳刚之气与大无畏的英雄主义的乐趣和启迪——因此我们编辑出版了这套《世界英雄史诗译丛》。

**译林出版社**

## 译 序

陈中梅

他站立在西方文学长河的源头上。他是诗人、哲学家、神学家、语言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地理学家、农林学家、工艺家、战争学家、杂家——用当代西方古典学者 E. A. Havelock 教授的话来说,是古代的百科全书。至迟在苏格拉底生活的年代,他已是希腊民族的老师;在亚里士多德去世后的希腊化时期,只要提及诗人(*ho poiētēs*),人们就知道指的是他。此人的作品是文艺复兴时期最畅销的书籍之一。密尔顿酷爱他的作品,拉辛曾熟读他的史诗。歌德承认,此人的作品使他每天受到教益;雪莱认为,在表现真理、和谐、持续的宏伟形象和令人满意的完整性方面,此人的功力胜过莎士比亚。他的作品,让我们援引当代文论家 H. J. Rose 教授的评价,“在一切方面为古希腊乃至欧洲文学”的发展定设了“一个合宜的”方向。这位古人是两部传世名著,即《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作者,他的名字叫荷马。

### 荷马·荷马史诗

古希腊人相信,他们的祖先中有一位名叫荷马(Homēros)的歌手(或诗人),他创编过宏伟、壮丽和含带浓烈悲剧色彩然而却是脍炙人口的史诗,是民族精神的塑造者,民族文化的奠基人。一般认为,荷马出生在小亚

细亚沿岸的希腊人移民区(因而是一个伊俄尼亚人)。<sup>①</sup>据后世的《荷马生平》和其他古代文献的通常需要使用“沙里淘金”的记载,荷马的出生地至少多达七个以上。至公元前六至五世纪,古希腊人一般将他的“祖城”限定在下列地名中的一个,即基俄斯(Chios)、斯慕耳那(Smurna)和科洛丰(Kolophōn),其中尤以基俄斯的“呼声”最高。在一篇可能成文于公元前七世纪末或六世纪初的颂神诗《阿波罗颂》里,作者以一位顶尖诗人的口吻称自己是一个“来自山石嶙峋的基俄斯的盲(诗)人”(tuphlos anēr),是一名最出色的歌手(参考 aristeusousin aoidai,《荷马诗颂·阿波罗颂》172—173)。<sup>②</sup>马其顿学家斯托巴欧斯(Stobaeus, Johannes, 即斯多比的约翰)编过一套诗文集,其中引用了从荷马到塞弥斯提俄斯的众多古代诗人和作家的行段语句。<sup>③</sup>根据他的记载,抒情诗人西蒙尼德斯曾引用荷马的诗行(即《伊利亚特》6.146),并说引用者认为这是一位“基俄斯(诗)人”的话

① 伊俄尼亚人是古希腊人的一个重要分支,原先栖居希腊本土,以后(受多里斯人逼迫)由雅典一带向小亚细亚沿海地区移民(参考希罗多德《历史》(即《希腊波斯战争史》)1.145—148,修昔底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1.12;另见斯特拉堡《地理》634)。荷马曾提及当时尚不很著名的伊俄尼亚人(《伊利亚特》13.685)。

② 修昔底得认为此篇乃荷马的作品(即由荷马本人所作),并称其中的有关文字是荷马对自己作品的评价(参考《伯罗奔尼撒战争史》3.104.4)。修昔底得很可能是受到了当时流行的一些传闻的影响——在公元前六至五世纪,荷马被认为是一批古代叙事诗歌的“制作者”。一般认为,《阿波罗颂》系由荷马身后的某位匿名诗人所作,很可能出自某位“荷马后代”(参考下文和本译序第6页注②)的手笔。

③ 斯托巴欧斯生活在五世纪,但他的手头却无疑握有一大批现已佚失的古代诗文学作品。他的编纂原为教授儿子,共编作品四卷,分别载有 *Eklogai* 和 *Anthologion*, 后者得以幸存至今。

(Chios eeipen anēr)。① 值得一提的是，西蒙尼德斯没有直呼荷马其名，似乎以为只要提及“基俄斯人”，听众和读者就会知晓它的所指。上述引文或许还不能一锤定音地证明荷马（或一位创编过史诗的盲诗人）的家乡就是小亚细亚的基俄斯岛，② 但至少可以就诗人的故乡问题给我们提供一个大致范围或参考项，为我们了解荷马其人提供一些虽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粗线条”的线索。

据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推测，特洛伊战争的开打年代约在公元前1250年左右。据“帕罗斯石碑”记载，希腊人攻陷特洛伊城的时间约在前1209—1208年。古希腊学者厄拉托塞奈斯(Eratosthenēs, 约出生于前275年)对此进行过文献考证，认为前1193—1184年是可以接受的提法。近代学者将破城时间定在前十三或十二世纪，即慕凯奈(或迈锡尼)王朝(前1600—1100年)的后期。荷马肯定不是特洛伊战争的同时代人。按《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作者、活动年代稍后于希罗多德的修昔底得的估算，荷马生活在特洛伊战争结束之后，但其间不会相隔太久远的年代。③ 与之相比，希罗多德的记叙似乎更多地得到了近当代学

① 阿摩耳戈斯(Amorgos)的西蒙尼德斯生活在公元前七世纪。有专家认为，引用者许为拜俄斯(Keos)的西蒙尼德斯，后者年龄稍长于品达，活动年代约在前六世纪末和五世纪初(参考 G. S. Kirk, *The Iliad: A Commentary* volume 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 2; 比较 U. von Wilamowitz-Moellendorf, *Saphor and Simonides*, pp. 273—274)。

② 生活在公元前五世纪的荷马问题专家、萨摩斯人斯忒新伯罗托斯(Stesimbrotos)认定荷马是斯慕耳纳人，并称那里有诗人的祠堂，受到当地人像对供神般的崇敬。其他争抢荷马出生地的作者似乎也都有各自的理由，但相比之下，他们的“证据”似乎都还没有强劲到足以推翻荷马是“基俄斯盲诗人”的地步。

③ 参考《伯罗奔尼撒战争史》1.3.3。修昔底得比希罗多德更重视史实和考证，对一些无法确切考证的往事或故事(mythoi, 如荷马述说的某些传奇和神话)，他的兴趣显然不会太过浓烈。



者的重视。“赫西俄德和荷马”，希罗多德写道，生活在“距我四百年之前”，隔距“不多于此数”。<sup>①</sup>希罗多德写作《历史》的年代约在前435年左右；据此推算，荷马的在世时间似乎应在前835年前后。然而，希罗多德不太同意当时通行的以四十年为一代（四百年即为十代）的提法。在《历史》2.142.2里，他提出了以“三代人为一百年”的算法。如果按此理解推算，十代人的生活时段就不是四百年，而是三百三十年左右。<sup>②</sup>如果这一理解可以成立，那么荷马的生活年代就不是公元前九世纪，而是一些近当代西方学者倾向于赞同的公元前八世纪。公元前八世纪肯定将是一个伟大的世纪，如果它真的哺育过一位绝顶和无与伦比的诗才，真的“酝酿”和蔚成过一代凝重、巍峨和遒劲的诗风，真的完成了一部雄浑、初朴和弥足珍贵的古代百科全书——一句话，如果它真的养育和造就了“神圣的荷马”。<sup>③</sup>

关于荷马的创作和生活，我们所知甚少。<sup>④</sup>从《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主要取用伊俄尼亚方言编制这一点判

① 《历史》2.53.2。在希罗多德看来，荷马和赫西俄德是古希腊系统神学的创始人。波尔夫里俄斯(Porphurios)等古代学者尊荷马为神学家(详阅 R. Lamberton, *Homer the Theologia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pp. 22—31), 亚里士多德有时亦相当慷慨地把“神学家”的头衔授给赫西俄德等讲诵神话故事的诗人(参考《形而上学》3.4.1000a 9, 12.6.1071b27)。

② 笔者在此沿用了西方学者的观点。详见 G. S. Kirk, 引书同本译序第3页注①, 第3—4页。荷马的活动年代可能略早(即早于前八世纪), 但似不太可能迟于前七世纪初叶。基俄斯史学家西俄庞波斯(Theopompos, 约出生于前378年)将荷马的生卒测定在公元前七世纪, 但他的提法没有, 并且似乎也不太可能得到学界的普遍认同。

③ 参考 H. L. Crosby and J. N. Schaeffer, *An Introduction to Greek*, Boston: Allyn and Bacon, 1928, p. 265。

④ 后世文人编写的所谓《荷马生平》均为臆想和杜撰之作, 其中充斥各种难以信靠的奇谈, 较少真正有价值的资料。

断,推测作者为伊俄尼亚人似乎不会有太大的问题。荷马(或《伊利亚特》的原始创编者)熟悉爱琴海以东的小亚细亚沿海地区。诗人讲述过亚细亚泽地上的鸟群,称它们四处飞翔,“展开骄傲的翅膀”(详见《伊利亚特》2.459—463),提到过从斯拉凯(即色雷斯)横扫而来的风飙(《伊利亚特》9.5)。他知道伊卡里亚海里的巨浪(《伊利亚特》2.144—145),知晓在阳光明媚的晴天,登高者可以从特洛伊平原眺见萨摩斯拉凯的山峰(参阅《伊利亚特》13.12以下)。<sup>①</sup>读者或许可以从《奥德赛》里的盲诗人德摩道科斯的活动中看到荷马从艺的踪迹(必须指出的是,德摩道科斯并非天生的瞽者;荷马若为盲人,情况也当如此),可以从众多取材于生活的明喻中感觉到诗人对现实的体验。抑或,他会像《奥德赛》里的英雄奥德修斯那样浪迹海外,“见过众多种族的城国,晓领他们的心计”(1.2—3);抑或,他也有快似思绪的闪念,“此君走南闯北,以聪颖的心智构思愿望:‘但愿去这,但愿去那,’产生许多遐想”(《伊利亚特》15.80—82,比较《奥德赛》7.36)。诗人对战争的残酷有着深刻和细致的理解,对人的掺和些许喜悦的悲苦命运表现出炽烈和持续的同情。他或许身临和体验过辉煌,或许有过幸福和得志的时光,但他肯定经历过“不一而足”(埃斯库罗斯语)的苦难,吞咽过生活带给他(和所有凡人)的辛酸。毕竟,凡人“轻渺如同树叶,一时间生机盎然,蓬勃……尔后凋萎,一死了结终生”(《伊利亚特》21.464—466)。在早已失传的《论诗人》里,亚里士多

① 另参考《伊利亚特》24.614以下。当然,诗人也可以依据别人的转述构思,并非一定要有身临其境的经历。对有关荷马生平的一点揣测或引申,我们都应持审慎的态度。

德称荷马晚年旅居小岛伊俄斯，并卒于该地。<sup>①</sup>荷马死后，活跃在基俄斯一带的“荷马的后代们”(Homēridai)继续着老祖宗的行当，以吟诵荷马史诗为业。他们的活动至少持续到伊索克拉底和柏拉图生活的年代。<sup>②</sup>

早在公元前735年及以后，史诗中的一些著名场景已开始见诸古希腊陶器和瓶画。1954年出土于伊西亚(Ischia)的一只陶瓶上题有描述奈斯托耳酒杯的诗行(参阅《伊利亚特》11.631以下)。据考证，此瓶作于公元前725年。<sup>③</sup>此外，史诗中的一些行句已被生活在公元前七至六世纪的诗人们袭用，散见于赫西俄德、阿耳基洛科斯、图耳塔俄斯、斯忒西科罗斯和阿尔克曼的作品中。科洛丰诗人哲学家塞诺芬尼(Xenophanēs, 约出生在公元前570年)知晓荷马(片断9—10)，厄菲索斯哲学家赫拉克利特(写作年代约在前500年左右)亦曾提及荷马的名字(片断42、56)。然而，塞诺芬尼和赫拉克利特都没有明确结合《伊利

① 亚里士多德此论的依据出处何在，我们已不得而知。另参考普利尼《自然历史》4.12。据传荷马的母亲是伊俄斯人。伊俄斯(Ios)是爱琴海中的一个岛屿，位于塞拉(Thera)以北，现名尼奥(Nio)。

② Homēridai是个有组织的活动群体，类似于后世的(同业)行会。参考品达《奈弥亚颂》2.1—2，柏拉图《斐德罗篇》252B。“荷马的后代们”也讲述荷马的生平(参考柏拉图《国家篇》10.599E)。行会成员最初可能由荷马的子孙和亲属组成，以后也吸收其他吟诵诗人(rhapsōidoi)入会，后者常对荷马史诗进行各种自以为有必要的改动，包括较大幅度的增删。行会成员中或许有某种形式的手抄文本流传；荷马史诗最早的抄本(或录本)很可能出自他们的手笔。在公元前七至五世纪，或许正是由于他们的活动传播和扩大了荷马的影响，此外似乎也为荷马是“基俄斯盲诗人”的说法奠定了理所当然的基础。

③ 此类瓶画的出现几乎与荷马的生活和创作年代同步。考虑到荷马是古代史诗的集大成者(而非从无到有的原创者)这一事实，我们似乎没有理由完全排除瓶罐艺术家们取材于前荷马史诗(或篇幅不长的唱段)的可能(参考 *A Companion to Homer*, edited by A. B. Wace and F. H. Stubbins, New York: The Macmillan, 1963, p. 40)。

亚特》和《奥德赛》谈论荷马。在当时，荷马几乎是古代史诗的代名词。换言之，评论家们可以把任何一部古代史诗（如《小伊利亚特》、《英雄后代》、《库普里亚》以及众多的“诗颂”，包括上文提及的《阿波罗颂》等）归于荷马的名下。开俄斯的西蒙尼德斯提到过《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以外的荷马史诗（片断32），抒情诗人品达也在诗篇中多次提及不为后人知晓的荷马史诗（参考《普希亚颂》4.277以下，《奈弥亚颂》7.17以下，片断28等处）。荷马（史诗）是叙事诗的另一个“指称”，是古代诗歌（指讲述神的活动和英雄们的业绩的史诗）的得到全民族认同的代表，是以往的诗歌文化留给后人的具有典范意义的象征。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生活的年代。柏拉图似乎是有意识地把荷马“专门”看做《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作者。在《诗学》里，亚里士多德客观上最后终止了前人或多或少地“泛谈”荷马（史诗）的做法，将荷马“确定”为《伊利亚特》、《奥德赛》和《马耳吉忒斯》的编制者。<sup>①</sup>

据古文献介绍，莱斯波斯诗人忒耳潘达罗斯（Terpan-dros，活动年代约在公元前645年前后）是一位擅写诺摩斯的作曲家，曾给自己的诗作和荷马史诗中的某些段子谱曲。他曾长期在斯巴达从艺，据说曾在该地唱诵荷马的作品。<sup>②</sup> 公

① 和柏拉图一样，亚里士多德把《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看做古希腊悲剧的前身（参阅《诗学》第四章）。*Margites* 意为“疯子”（比较 *margos*，“疯狂的”），是一部用六音步长短短格（但也掺用更接近于口语的三（双）音步短长格）写成的“傻瓜史诗”，可能成文于公元前六世纪，据说作者是庇格瑞斯（Pigrès），确切与否已难以考证。主人公马耳吉忒斯是一位古代的“傻子西蒙”（Simple Simon）。连亚里士多德都还把《马耳吉忒斯》归为荷马的作品，公元前四世纪以前的诗人和评论家们在这一问题上的模糊意识当可想而知。

② 忒耳潘达罗斯亦擅写“序曲”（*prooimia*），为一种类似于《阿波罗颂》的长诗前的“开场白”。

元前六世纪，雅典执政裴西斯特拉托斯( Peisistratos) 指派俄诺马克里托斯( Onomacritos) 从众多的手抄本中整理和校勘出日后成为规范诵本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作为吟诵诗人们( rhapsōidoi) 选材的依据。裴西斯特拉托斯还将吟诵荷马史诗增列为每年一次的泛雅典庆典( Panathenaia) 里的比赛项目( 另参考第29页注①)。基俄斯“荷马后代”的成员库奈索斯( Kunaihos) 曾于公元前504年在西西里的苏拉库塞首次吟诵荷马史诗。<sup>①</sup>吟诵诗人的活动促进了荷马史诗的流传，扩大了它的影响，为它的最终进入千家万户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就在柏拉图伏案写作《国家篇》并以大量篇幅激烈抨击荷马及其史诗( 主要针对《伊利亚特》) 的时候，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是，荷马已是象征希腊传统的偶像，荷马史诗( 即《伊利亚特》和《奥德赛》) 已经凝聚起民众的精神，构成了民族文化的结合历史和充满诗意想像的底蕴。荷马已是希腊民族的教师。<sup>②</sup>

毫无疑问，荷马的取向主要是文学的，他的成就主要也体现在文学方面。但是，我们同样不可否认的是，他的史诗也像其他任何优秀的文艺精品一样，在解析的层面上超出了一般的就文论文的范围，含带接受哲学“揭示”

① 在公元前五至四世纪，rhapsōidoi 是一个颇受公众欢迎的职业群体，他们频频出现在各类庆典活动之中，参加比赛，争获奖酬。柏拉图笔下的伊安亦是一位吟诵诗人。有趣的是，柏拉图把《奥德赛》里的非弥俄斯也划入了 rhapsōidoi 的行列( 参阅《伊安篇》533 B—D)。吟诵诗人也附带说诵荷马以外的其他诗家的作品。另参考柏拉图《国家篇》3. 395A，色诺芬《回忆录》4. 2. 10和《饮讨会》3. 6。

② 《国家篇》10. 606E。另参考 595C。诗是古希腊儿童的必修课。受过良好教育的希腊公民几乎无例外地熟悉荷马史诗，许多人熟记其中的精彩段落，有造诣的诗人和著述家们大都能信手摘引荷马。据色诺芬记载，尼基阿斯曾要求儿子尼开拉托斯研习和背诵全部荷马史诗(《饮讨会》3. 5)。

和研究的潜义。早在公元前六世纪下半叶,古希腊学者已从语义和“所指”的角度出发对荷马史诗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从现存的古文献来看,雷吉昂的塞阿格尼斯(Theagenēs)很可能是著书专论荷马史诗的第一人。<sup>①</sup>他写过一部《论荷马》(已失传),试图从深层次上揭示荷马史诗的寓意,认为作品中的神名分别寓指自然界中的物质。这种寻找“蕴意”(huponoia)的探索大概并非总能成功,而且也肯定难以避免牵强,但它能把人的关注引向文本之外,引向对“关联”和“实意”的重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寓指(allēgoria)包含初朴的哲学内涵,带有向哲理趋同的倾向。无怪乎教授过苏格拉底的哲学家阿那克萨戈拉(Anaxagoras)曾对这种研究方法产生过浓厚的兴趣,在学界率先揭示了荷马史诗与勇力和公正的关联(比较阿里斯托芬《蛙》1034以下)。朗普萨科斯的迈特罗多罗斯(Metrodoros)是伊壁鸠鲁学说的忠实支持者,熟悉阿那克萨戈拉的宇宙论。他曾独辟蹊径,用成套的阿那克萨戈拉的宇宙论术语解释整部《伊利亚特》,<sup>②</sup>其用心似乎是想疏通诗与哲学之间的“隔阂”。亚里士多德尊崇荷马,赞赏荷马的诗才,写作中曾频频摘引他的史诗尤其是《伊利亚特》中的行句,在现存的著作中即有114次之多。他写过一部《荷马问题》(可惜仅剩片断传世),书中荟萃前人和

① 参见 R. Pfeiffer, *History of Classical Scholarship from the Beginning to the Hellenistic Age*, Oxford, 1968, pp. 10—11. 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当时肯定已经有了成文的荷马史诗。

② 详阅 N. Richardson, *The Iliad: A Commentary* volume 6,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29. 斯特拉堡大概更愿直截了当,干脆称荷马史诗为“哲学论著”(philosophēma,《地理》1. 2. 17)。荷马自然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哲学家,但他肯定已是一位有造诣的神学家(参考第4页注①)。

同时代学者的研究成果,梳理了“问题”的类型并进行了有针对性和经常是颇具说服力的解答。《诗学》第二十五章择要讨论了荷马史诗中的某些问题,进行了含带明显偏袒倾向的解释,其总体取向当大致和《荷马问题》相似。<sup>①</sup>

作为一位酷爱诗歌并在年轻时代写过悲剧和酒神颂的哲人(philosophos),柏拉图无疑比其他古希腊思想家(包括赫拉克利特、阿那克萨戈拉和以擅能诗化见长的恩培多克勒及巴门尼德等)更多和更深地受到文学的感召、浸染和多方面的陶冶。他所接受的传统是荷马的,哺育他成长的教育和人文观取向是荷马的,就连他所严厉批评的传统文化意识里的负面因素常常也是荷马或与荷马和赫西俄德有关的。对荷马史诗超乎寻常的熟悉,<sup>②</sup>使柏拉图几乎是出于本能地把谈话的主角苏格拉底描绘成了荷马史诗里的英雄。苏格拉底坚毅、刚强,像荷马和其他诗人所描述的英雄们一样能够经受严寒、战乱和各种逆境的考验。作为新时代的英雄,他富有智慧,自制力(sōphrosunē,此乃荷马提倡的美德)极强,比古代的豪杰们(如忒拉蒙之子埃阿斯等)更能抗拒酒和美色的诱惑。在《奥德赛》里,奥德修斯的活动是“探求”(philosophein)式的。他忍辱负重,漂洋过海,审视接触交往的人们,探察

① 对这一问题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参阅 A. Römer 的文章 *Die Homercitate und die homerische Frage des Aristoteles*, *Sitzb. Bayer. Akad.* (1884), pp. 264—314 以及 M. Carroll 的博士论文 *Aristotle's Poetics Ch. 25 in the Light of the Homeric Scholia* (Baltimore, 1895) 中的相关论述。此外,亚里士多德还专门为他的学生亚历山大校勘和点评过一部《伊利亚特》。

② 据 G. E. Howes 考证,柏拉图引用荷马诗行的次数多达 150 例(详见 *Homeric Quotations in Plato and Aristotle*, *Harvard Studies in Classical Philology* 6 (1895), pp. 153—210)。

他们的心态。同样,苏格拉底串街走巷,不辞辛劳,“盘问”不同阶层的人士,启发他们的心智,讽喻他们的无知,引导他们正确评估自己,去除自以为无所不知(而实则一无所知)的虚假认识。认识自己是认识世界的起点,而不受审视的知识的大量堆积或许并不一定就是一件好事。像荷马一样,柏拉图爱讲故事(muthoi),他的创新在于改变了故事消极的“渎神”倾向,使其包容更多含意深刻、隽永的哲理(或者说,玄意)。在《国家篇》8.545D里,柏拉图声称他将“像荷马一样”(hōsper Homēros)祈求神灵,而他的叙述将沿用悲剧的风格(tragikōs)。《国家篇》是“我们用词语讲说的故事”(muthologoumen logoi, 5.501E)。在该篇对话的结尾部分,柏拉图(自然还是通过苏格拉底)兴致盎然、信心十足地讲起从本质上来说不同于荷马“灵魂论”<sup>①</sup>的故事。他声称有关艾耳<sup>②</sup>的故事“不是对阿尔基努斯说的那种,<sup>③</sup>而是关于一个勇敢者的经历……”。如果

① 荷马区分了身体(demas, sōma)和心魂(psychē,或魂气)。人死后,psychē从口中呼出,离开肉体,前往哀地斯控掌的冥府,像一缕轻烟(《伊利亚特》23.101)。死人以虚影(eidōla)的形式存在,一般不可能再生或重回阳间。

② 在《国家篇》第十卷里,为了证明心魂不灭、生命轮回和因果报应等宗教观点,苏格拉底讲述了“艾耳的故事”。勇士艾耳是阿耳墨纽斯之子,战死后进入地府,十二天后还魂(即再生)人间,讲说了他在冥地的见闻。柏拉图熟悉毕达戈拉的心魂学说,受奥菲俄斯宗教的影响至深。

③ 《国家篇》10.614B。阿尔基努斯乃法伊阿基亚国王(《奥德赛》6.12,7.185),接待过奥德修斯。后者曾对他讲述自己的经历,包括在冥府会见众多魂影的情景(详见《奥德赛》11)。D. L. Page称《奥德赛》第十一卷原为一个独立的故事,后被编者纳入《奥德赛》的体系(参阅 *The Homeric Odyssey*, Oxford, 1955, pp. 21—51)。然而,此卷内容似乎并不和《伊利亚特》中的有关描述(参见注①)构成不可调和的矛盾。值得一提的倒是本章内容的某些“亚细亚”色彩,它的原始作者(不管是不是荷马)大概不会闻所未闻类似于亚述(或苏美里亚)史诗《吉尔伽美什》等在小亚细亚广为流传的作品。参阅 G. K. Gresseth, *The Gilgamesh Epic and Homer*, *Classical Journal* 70(1975), pp. 1—18。



说荷马史诗包蕴接受 allegoria 解释的潜力,柏拉图则是有意识地大量使用了神话和故事(muthoi,单数 muthos,“秘索思”),通过诗人的拿手好戏,即“讲故事”的方式表述了某些在他看来用纯理性叙述(即 logos,“逻各斯”)所无法精确和令人信服地予以有效阐述的观点。<sup>①</sup>这当然表明了柏拉图的聪明和达练,但似乎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一个事实,即故事(或者说,诗歌、文学)的重要,说明了荷马的行当,亦即讲故事的方式,是人类在逻各斯以外的另一条走向并试图逐步和渐次昭示真理的途径。成熟的哲学不会(事实上也很难)抛弃秘索思。在西方文学和文明发展的早年,荷马史诗是古希腊人智慧的结晶。当哲学(或逻各斯)磕磕绊绊地走过了两千多年理性思辨的路程但却最终面临“山穷水尽”之际,秘索思是逻各斯惟一可以寻索的古代的智慧源泉——充满离奇想像却包含粗朴和颠扑不破真理的“她”是帮助逻各斯走出困境的法宝。<sup>②</sup>秘索思也是

① 比如在晚年写成的《蒂迈欧篇》里,柏拉图通过很可能是由他自编的“大西洋岛的故事”,表达了他的宇宙论思想中的精华。在一些有影响的“对话”里,秘索思既是构成文本不可分割的部分,又是连贯和畅导(包括深化)作者思想的纽带。秘索思在《美诺篇》、《斐多篇》和《高尔吉亚篇》里占据中心位置,在《斐德罗篇》和《会饮篇》里占用了大比例的篇幅。最后,在《蒂迈欧篇》里,诚如 P. Friedländer 所说的,几乎“填满了整篇对话”(Plato 1: *An Introduction*, translated from the German by Hans Meyerhoff, Princeton, 1969, p. 198)。

② 随着科学的发展和时间的推移,文学与哲学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分家后(当然这种“分家”常常是不彻底的,因为任何需要并以种种方式铺设终端的博大的思想体系似乎都很难完全避免形而上的猜想,而诗化是形而上学的特征之一),当今又呈现出某种程度上重新弥合之势。现当代一些有影响的哲学家们把语言看做存在的居所(如海德格尔),因而经常标榜自己摆脱了系统哲学的束缚。然而,他们其实并没有走出西方传统文化的氛围,仍然在逻各斯和秘索思这两个互连、互补和互渗的魔圈里徘徊。维特根斯坦从神秘性走向解说的信心,而海德格尔则从反传统走向“诗”和“道”(Ereignis)的神秘性。